

晨光映书页

杨锐

暑假，把城市的喧嚣丢在身后，带着孩子们回了老家。车过县城，柏油路渐渐让位给蜿蜒的水泥路，青山像被谁漫不经心地泼了浓墨，一路铺到天际，一条清溪跟着路转，哗哗的水声成了最天然的背景音乐。

乡下的日子自带生物钟。不用闹钟，天刚蒙蒙亮，生物钟就轻轻将我唤醒。起来时，身边的孩子们还陷在酣眠里，小脸红扑扑的，睫毛上沾着晨露似的微光。我蹑手蹑脚搬了凳子到阳台，晨雾还没散尽，远处的山尖浮在白茫茫的水汽里，像水墨画里未干的笔触。

有三方特别的“书桌”，在记忆里生了根似的。

第一方特别的“书桌”，是我家的大土炕。儿时，老屋里有一盘大土炕。炕上铺着印了花朵的浅粉色炕单，那花盘比我家盛菜的碟子还要大上一两圈，花瓣一层叠着一层，厚厚的，又密密的。

趴在炕上写作业，写着写着，就开小差了。炕单上的花扯走了我的目光，盯着那花朵，思绪如野马奔腾：一阵风吹来，这花会不会随风起舞？母亲要能在院子里种几棵这样的花，这寂静的院子得有多热闹？要是我能有一件这样的花裙子，穿着它得多惹眼？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中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似步履踉跄的酒鬼。

第二方特别的“书桌”，是我家的四脚矮木桌。那张桌子，现在早已不见踪迹。但很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学童的时候，它不仅是我家的餐桌，还是我的书桌。桌子通身是深棕色，桌面并不平整，中间位置是两块木板咬合的缝隙，右下角有一个拇指肚大小的凹坑，坑里黑乎乎的，像桌子的一只眼睛，只是少

了阳光朝东，晨光正顺着山坳漫过来。起初是淡淡的青白，染亮了窗棂，接着渐渐洒出蜂蜜水般的暖黄，稠稠地泼洒在摊开的书页上，字里行间顿时有了温度。指尖划过纸页，能触到阳光的纹路，沙沙的翻页声，混着远处树林里的鸟鸣，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
风从河面上溜过来，带着水草的潮气和禾穗的清甜，掀动书页的边缘，白得蓬松，像是被晨露洗过的棉絮。它走得很慢，影子在对面的庄稼地里缓缓挪移。田埂上有早起的农人，戴着草帽弯腰除草，身影被晨光拉

得很长，与田垄构成一帧安静的剪影。

山野的清晨从不缺声响，却不显嘈杂。先是几声清脆的鸟鸣从槐树上落下来，像撒了把碎银；接着有母亲给门前的花草浇水的声音，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；偶尔有摩托车驶过村道，引擎声远远来又远远去，反倒衬得周遭更静了。这些声音和着书页上的文字，在晨光里酿成一种奇异的安宁，让心像被温水泡过的茶叶，慢慢舒展开来。

看累了便小憩片刻，晨光已爬过书页，漫到手腕上。对面的玉米地绿得发亮，叶片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成碎钻，风过时，整片玉米地便漾起绿

特别的“书桌”

商丽燕

了眼睛的光泽和灵气。

吃饭的时候，它是饭桌，被父亲抱上土炕，再用抹布擦一遍，顷刻间俊俏了几分。米饭、大馒头、烩豆角、菜包子、鸡蛋饼、疙瘩汤、油炸糕……样样可口的饭菜被小木桌“照单全收”。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而坐，吃着、说着、笑着，小木桌像一位忠实的听众，安安静静地侧耳倾听。趴在小米桌上写作业，常常是晚饭后事情。母亲洗刷完碗筷，喂过了猪羊鸡，坐在炕上开始纳鞋底。我趴在小米桌上，面前是打开的作业本。“你看，这个字你写得对吗？”坐在旁边的父亲指着作业本上的“寒”字问。“咋了？”粗心的我很不服气。“你好好看看，这个字怎么写？”我拿着作业本盯着“寒”字看，半天看不出个名堂。父亲要我拿出生字卡，他指着放大的“寒”字说：“你看，宝盖头下面

是三横四竖，不是一笔下来的‘人’。”经父亲这么一指点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一直在写错别字。

如今，父亲，这个为我指出错别字的人离开三十年了。矮木桌品尝过酸甜苦辣，也亲历过生离死别。

第三方特别的“书桌”，是母亲专属的“牡丹”牌缝纫机。这台缝纫机是母亲结婚时的彩礼。母亲是使用缝纫机的一把好手，细心呵护之下始终崭新如初的缝纫机摆在窗边，母亲坐在缝纫机前的木凳上，身子微微前倾，眼睛牢牢盯住飞速起落的机针，左手轻按布料匀速往前推送，右手指尖随时微调布料松紧，双脚踩动踏板轻重有度，快慢随心。“哒哒”的机声错落悦耳，厚棉布的，确良，软绒布在她手下从不走斜起皱，针脚匀称细密。街坊邻里但凡有缝补、

浪，哗啦啦地响，像是在和天空说着悄悄话。去年才栽下的桃树，枝丫斜斜地探进晨光里，每片叶子都捧着一团光。

这样的清晨，没有日程表，没有未读消息，只有光、风、文字和生长的声音。在城市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被时钟的滴答声迫着跑，而在这里，晨光漫过书页的速度，庄稼拔节的节奏，都在教你慢下来。原来最丰盈的收获，从不是追赶而来的，而是像这晨光，在你静静等待时，自会铺满书页，像这庄稼，在你耐心守望时，自会结出果实。

孩子们的笑声从屋里传出来时，晨光已越过阳台的栏杆，在地上织出金色的网。合上书页，指尖还留着阳光和纸墨的温度，心里却装满了比文字更饱满的东西。那是自然的馈赠，是慢下来的时光，是在晨光里重新生长的安宁。

做新衣的活计，都专程寻到家里来。无论是缝补磨破的衣衫，还是裁缝新衣，母亲都格外用心。

坐在缝纫机前写作业，恍惚中总觉着自己也变成了母亲一样的裁缝，以纸张为布料，用笔墨做针脚，一针一线，缝制着自己学识的衣衫。

眼下，每次走过儿子的书桌，看到桌上的书本玩具，心底不由得泛起阵阵想念，想念那土炕做书桌的日子，那是天真烂漫的日子；想念那矮木桌做书桌的日子，那严而有慈的教诲字字铭心；想念那缝纫机做书桌的日子，那有追寻理想的坚定脚步。

特别的“书桌”，串联起长长的半生，那些岁月，因为这一方方“书桌”，有了色彩和滋味，更有了一针一线缝制人生的笃定。

耐贫瘠而抗风霜；顺天时，春夏发而秋冬藏。其根深入土中，汲取水分；其叶舒于空中，广纳阳光。生生不息，彰显生命之顽强。

至于食用，可凉拌，可热炒，可清蒸，可煲汤。至于药用，可利尿，可消肿，可清热，可医疮。实乃食药两用之珍品。

大同黄花，历史悠久，底蕴深厚。文人墨客，为之心倾。诗词文章，颂其美名。今逢盛世，广聚贤能；有惠民新政，价值提升。货销欧亚，大美前程；香飘万里，四海扬名。祝小黄花大产业，蓬勃发展，一派光明。诗曰：

云中耀艳阳，一望是金黄。

蕊嫩游蜂喜，枝繁露水凉。

赏花如菊色，烹菜胜芹香。

不待成枯谢，农人采摘忙。

大同黄花赋

李登峰

大同者，踞三晋之北，扼京畿之要。山川形胜，人文荟萃。有奇卉焉，曰黄花，曰萱草，曰金针，实乃自然之瑰宝，塞上之精灵也。

植于火山之麓，沃野之壤；长于桑干之畔，清爽之风。春日萌蘖，翠叶纤纤如招手；夏日抽蔓，茎亭亭望晴空；盛夏开花，金英朵朵绽笑容。

其形也，五瓣舒展，七蕊攒聚，宛如金盏玉盘之美丽晨光；其花色也，纯黄似金，鲜妍夺目，不招蜂蝶之竹篱菊黄；其花香也，清幽淡雅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之深谷兰香。

黄花之美者，在其形色，亦在其质。性坚韧，

砥砺前行 笃行致远

——探寻同星抗生素公司的发展轨迹

张风新

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

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，同星公司始终以文化为根、以管理为脉，沉淀出独属于自身的企业文化体系。它并非空洞的理念堆砌，而是全体同星人普遍认可、共同践行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，深深渗透在企业运营的每一个环节，成为凝聚人心、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，筑牢了企业行稳致远的精神根基。

管理，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企业发展的永恒课题，唯有与时俱进、不断完善创新，才能助力企业在市场浪潮中站稳脚跟。正是秉持这样的深刻认知，同星公司早在1998年便创新性提出“无漏洞管理法”，这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，历经二十余年实践打磨，不断引领着企业管理迭代升级。

“无漏洞管理法”，核心在于直面问题、闭环解决：全面排查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中的各类漏洞，深入剖析漏洞产生的根源，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，完善制度，严格落地执行，彻底堵住漏洞，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出现，推动企业管理实现螺旋式上升、持续性进步。

在同星公司的管理逻辑里，企业运营中存在的各类问题，本质上就是管理漏洞。问题意味着发展差距，差距暗藏提升潜力，潜力终将转化为实际效益。基于这样的认知，同星人不惧困难、直面挑战，主动深挖问题、解决问题。公司建立完善激励机制，对用心发现问题、全力解决问题的干部职工给予重奖。这种直面问题、破解难题的企业文化，有效激活了企业自我革新、自我提升的生命力。

对于众多老牌企业而言，奖与罚的平衡，一直是难以破解的管理难题。而同星公司凭借对“奖与罚的实质与辩证关系”的深刻洞察，成功走出这一管理困局，构建起科学高效的奖惩体系。奖励，是对员工劳动成果的认可与肯定，是企业对员工付出的正向回馈。但在同星的理念中，员工领取奖励的那一刻，过往成绩就此归零，新的征程开启，

每一位员工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唯有摒弃“躺平”心态、放下过往功绩，朝着公司既定目标全力奋进，才能创造新的价值。这一机制，彻底杜绝了部分人员倚老卖老、坐吃老本的现象，打破了阻碍企业进步的桎梏，更为年轻员工搭建起施展才华的平台，让企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发展活力。

处罚的背后，是责、权、利三者相互作用、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。利益是履行责任的回报和激励，责任是获取利益的前提，权力则是连接利益与责任的桥梁，三者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。若出现失误却拒不接受处罚，本质上是放弃责任；没有责任担当，便无从谈起行使权力；放弃权力，自然也就失去了对应的利益。主动接受处罚，正是扛起责任、直面过错的直接体现。

通过全员达成对奖惩辩证关系的共识，原本怕担责任、回避处罚的员工，主动放下思想包袱，坦然接受管理、承担责任；各级领导干部敢于较真碰硬、善于精准管理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得以不折不扣落地执行，为企业规范化、高效化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，让企业文化真正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硬核实力。

从文化铸就到管理创新，从辩证认知到奖惩明晰，同星公司用独有的企业文化，构建起强大的内生动力体系，在大同工业发展版图上，书写着老牌企业守正创新、砥砺前行的奋进篇章，也为本土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与经验。

认知高度决定企业发展高度

市场经济，最终是一场优胜劣汰的筛选。土霉素原料药的赛道上，曾有百家企业逐鹿，风云际会，如今大浪淘沙，仅剩八家坚守。同星公司从最初设计的年产200吨，一路进击至8000吨的体量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，凭借清晰的发展定位与坚定的执行力抢占先机的必然结果。

市场竞争不存在一劳永逸，同星公司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。原有的市场秩序被打破，新的平衡亟待重建。这意

味着，下一轮的竞技，早已拉开帷幕，对手更强，赛道更宽，规则更严，竞争也更加残酷。昔日的较量，不过是规模、成本与质量的博弈；而未来的角逐，将升维至品牌、技术、文化乃至企业格局的终极比拼。正是深刻洞察到这种竞争的递进与残酷，同星公司始终保持着如履薄冰的清醒，直面挑战，才铸就了今日的辉煌。

在同星公司多年的生产史上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皆有下达，唯独没有利润指标。这并非轻视利润，而是源于对企业发展本质的深刻觉醒。在经营实践中，利润是过往努力的结果，是既定的成绩单，而非驱动前行的初心。同星坚信：实现长远的发展战略，才是企业真正的目标。利润只是服务于战略的手段，是战略达成后的自然馈赠。追求短期利润，可能意味着放弃技术攻关、忽视安全生产、敷衍环保治理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的“利润陷阱”。若为了完成年度指标而牺牲长远根基，企业终将陷入泥潭，难以为继。同星公司不设硬性利润指标，正是为了挣脱短视的束缚，放开手脚围绕战略目标，扎根根基，持续创新。

以环保为例，同星公司坚持早投入、快投入、高投入，即便一度推高成本、压缩利润，也坚定不移。如今，环保早已从成本项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反观那些只顾眼前利润、甚至弄虚作假的企业，最终错失良机，被时代无情淘汰。

不考核硬性利润，不等于不重视利润，而是看透了利润的本质，不受其绑架，心无旁骛地做正确的事，让企业健康生长，从而收获更长久、更宏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。

而对于不少企业心存畏惧甚至抵触，认为是“挑刺找茬”徒增负担的各类检查，同星公司认为，检查是一股宝贵

的外部推力，能帮助企业发现问题、正视问题、解决问题。尤其在安全生产、生态环保等关键领域，问题不被发现、隐患不被消除，就是悬在企业头上的风险，甚至直接威胁生存根基。检查，是送给企业的“免费体检”，是难得的提升契机，借检查之外力，可凝聚上下共识，高效、快速、高质量破解难题，甚至扫清多年积弊。如此好事，企业何乐而不为？古人云：“智者，当借力而行。”借检查之力，强企业之基，以检查促整改，以整改促提升，主动借势、借力、借智，正是一家企业走向成熟、彰显自信的鲜明标志。

从一城深耕到跻身全球土霉素原料药行业之巔，同星公司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拼搏，书写了大同本土企业逆势突围、铸就世界级工厂的传奇篇章。回望其成长历程，我们看到的是不惧竞争、勇立潮头的奋进姿态，是坚守初心、深耕实业的责任担当，是精益求精、追求卓越工匠精神，更是洞悉市场、谋定长远的经营智慧。

不被短期利润裹挟，始终以战略为纲筑牢发展根基；不畏惧市场残酷角逐，始终以创新为刃突破竞争壁垒；不松懈品质与责任坚守，始终以匠心为本铸就核心优势；不割裂与时代共生之路，始终以长远眼光践行绿色发展。同星公司的成功，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大同实业精神的生动缩影，是本土企业扎根古都、走向世界的鲜活典范，它用扎实的的发展成就，印证了实干兴企的道理，为全市工业企业树立了标杆；只要坚守实业初心、秉持工匠精神、深耕核心领域、勇闯市场挑战，大同企业完全能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，完全能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。（下）

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pcsy22@163.com）



大同工业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

采凉山下的大明尘梦

许玮

一

明正统十一年(1446)十二月,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三子、坐守大同的首任代王朱桂,走完了自己长长的一生,以73岁的高龄,在大同城内代王府离世。

塞上隆冬,寒气袭人。代王府里,朱桂的儿女们侍立在他的榻前,一派凄然。将近600年过去了,朱桂是病逝,还是因衰老而自然死亡,已很难考证,但可以肯定的是,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,他的寿命最长。从明洪武二十五年(1392)就藩大同以来,朱桂在塞北度过了整整54个春秋。他驻留之际,大同城已有朱氏嫡系千余。

73岁高龄,54年代王生涯,有明一代的藩王里,朱桂创造了多项“第一”。

与十几位哥哥相比,朱桂的一生政绩平平,可他历经了明朝六任皇帝——明太祖朱元璋、明惠帝朱允炆、明成祖朱棣、明仁宗朱高炽、明宣宗朱瞻基、明英宗朱祁镇,年号从“洪武”一直到“正统”。他去世那年,大同已有“土马甲天下”的威名。作为当朝皇帝,明英宗朱祁镇赐给这位曾叔祖的谥号是——简。简,简单、简化之意,说明朱桂这一生平平常常、简简单单,而且,他的一生确实如此。同时,为了表达对这位已然“元老”资格的曾叔祖的哀思,朱祁镇“辍视朝三日”。

关于朱桂,目前能够看到的各类明史典籍,对他的记载拢共不足千字,且评价不高。放眼明朝,276年的历史,分封藩王220余位,朱桂算不得响当当的人物,虽然他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。后世之人,很少再去探究那段历史了,而是循着前人既定的考证,对朱桂作出定义,甚至将其“妖魔化”。那么,他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?未知待解。还原真实的朱桂,既需要时间,更需要充分的史料来佐证。

在有限的历史记载中抽丝剥茧,我一直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朱桂。

明代张欽纂修的《大同府志》、清代黎中辅纂修的《大同县志》均记载,朱桂死后,葬在大同城外东北十里的采掠(凉)山。尘梦安然中,他一定祈愿大明江山永固。

二

代王府内,对朱桂的哀悼在继续,而代王家族新的王位继承人已经登上了宝座——他就是朱桂的长孙朱仕壘。

朱桂本来要传位于自己的嫡长子朱逊端,岂料朱逊端早逝,只好将王位传于长孙。那是明英宗正统十二年(1447)闰五月,朱桂去世的第二年。从“代理国事”到坐镇代王府,朱仕壘平稳地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。

代王王位以世袭的形式代代传承。从朱仕壘继承爷爷朱桂的王位开始,其间虽不乏争斗和角逐,但“嫡传”的制度相沿不改,和明王朝共始终。明崇祯十七年(1644),正值末代代王朱传爝在位,占领大同的大顺军领袖李自成,命人将朱传爝抓获并斩杀,延续了252年的代藩宗室就此落幕,而明王朝不久也在农民军的排山倒海中土崩瓦解。

从首任代王朱桂,到末代代王朱传爝,实实在在有11人在大同受封代王,另有2人被追封为代王,故13人享代王“尊号”。这13人性情迥然,有的骁勇善战、屡建奇功,有的诗书涵养、才学斐然,当然,不学无术者也有。明王朝早已远去,包括朱桂在内的所有代藩宗室,他们的故事也都烟消云散了。

从朱桂坐守大同,到明王朝覆灭,250多年间,代藩宗室主要成员死后,均建有规格不等的墓葬。《大同府志》《大同县志》记载,代王墓共有九处,其中简王朱桂墓、戾王朱逊端墓、隐王朱仕壘墓、懿王朱俊杖墓、昭王朱充耀墓、恭王朱延琦墓、定王朱鼎铉墓,位于大同城外东北处的采掠(凉)山一带,另有惠王朱成炼墓、思王朱鼎涑墓,在距采凉山不远的马铺山(为采凉山向西南延伸的余脉),素有“代藩九墓”之称,又桥头山、独角冈、齐家山、

七里山、合河山亦有代藩家族其他成员(郡王、郡主等)的墓葬,而这些地名如今已不易查找了。

王朝故事远矣,所有的谜团都凝固在了时间之下。

三

从代王墓先后落成到如今,时间已消逝了六百年,曾经的辉煌还有多少能够寻得?

当年,随着明王朝的终结,代王墓葬在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占领大同后,不同程度受到毁坏,可谓代藩墓葬第一次遭劫。据说,李自成为了发泄对明王朝统治的不满和愤恨,派兵对代藩墓葬群进行了洗劫(关于代藩墓所受大顺军破坏,正史并无记载)。清代吴辅宏纂辑的《大同府志》记载:“闯贼陷大同,阖门遇害。”不难想象,大顺军进驻大同后,代王家族蒙难之惨烈,基于此,代藩墓葬自然也在劫难逃。

其实,诸多历史信息可以间接佐证大顺军毁坏代藩墓。李自成从北京败逃前,下令火烧紫禁城。明末清初文人计六奇在《明季北略》中写道:“皇居壮丽,焉肯弃掷他人!不如付之一炬,以作咸阳故事。”这段话写的是李自成当时的心境——我得不到的,也不想留给别人。如此这般,之前在大同停驻的几日,毁掉几座代藩墓葬,又算得了什么!然而,我查阅了彭孙贻所著《流寇志》,及部分公之于世的《皇居壮丽,焉肯弃掷他人!不如付之一炬,以作咸阳故事》。这段话写的是李自成当时的心境——我得不到的,也不想留给别人。如此这般,之前在大同停驻的几日,毁掉几座代藩墓葬,又算得了什么!然而,我查阅了彭孙贻所著《流寇志》,及部分公之于世的《大顺抄件》,均未找到大顺军在塞北破坏代藩墓葬的记载。不过,这不难理解,与改朝换代的残酷相比,代王墓葬被毁,何以值得在史籍中提及呢?况且,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所到之处,明宗室惨遭屠戮,生者罹难之际,亡者之墓又怎能保全!

李自成离开大同五年后,清顺治六年(1649)农历八月,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军攻陷大同,在“血流”大同城的同时,派兵对城外的代藩墓地进行焚毁,据说这是为了绝大明朱家之后(关于这段历史,清史也无记载),可谓代藩墓葬第二次遭劫。经过两次践踏,代王家族的大部分墓葬仅剩残砖瓦砾,如果真的在采掠(凉)山和马铺山的青翠草木间,已经很难寻找了,徒留后人的声声叹息。

青山茫茫,时间不停,一切的繁华或悲凉都成了过往。

四

某一日,我来到了代藩墓地。时光悠远,无法预见的力量,改变着万物风貌。

经过战争毁坏、人为盗掘,代藩墓葬早已面目全非,加之数百年风雨侵蚀,山川易容,后世所见,仅留零星的、无法确认墓主身份的荒冢。荒冢之上,野花执拗地对抗着季节的风霜,采一束野菊花放在墓家前,引来嗡嗡嘤嘤的蜜蜂停落花上。

作家祝勇在一篇文章里写道:“我突然觉得在他们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之间存在着一通道,就像树下的根系,在大地的深处隐秘地相连。”(《站在清兵的墓前》)我虽然无法辨识眼前残存的墓冢究竟埋葬着哪位代王,但内心涌荡着和祝勇先生一样的感慨。我相信,大地深处,一定响起过他们的悲吟与呜咽,只是,时间的磅礴中,所有的宏大或卑微,都变得安谧如初,只有坚守本心的往来者,才能在时间之下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。

我向一位晒太阳的老者打听代藩墓的往事。老者年约七旬,额上镌刻着深深的皱纹。他先是摆摆手说不知道,显出一脸的茫然,继而又问我“朱元璋的儿孙咋能埋在这里?”我无法用几句话回答老者,笑一笑,环顾四下。青山依旧,前人早已作古,如我这般的探寻,在老者眼里或许是一种徒劳。六百年前的大明尘梦,时间之下的繁华或败落,于今人而言,没有太多现实的意义了——搞清楚怎样?搞不清楚又怎样?

也许,所有的谜团,只能寄希望于时间给出答案。



古刹梵音(国画)

王世奇作